

马礼逊学校与 容闳留美前所受的教育

吴义雄

在容闳之前，也曾有一些中国人到西方的各类学校学习。但长期在美国接受正规教育，并在美国著名大学（耶鲁大学）取得学位，当首推容闳。由于研究资料的缺乏，我们对容闳的生平和思想难以有深入细致的研究，对他留学之前的情况，所知更为有限。本文试图对马礼逊教育会学校的具体情形，在笔者所可接触到的资料条件下，作尽可能全面的探讨，并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考察容闳留学之前所受到的教育，希望得到专家的指正。

—

1834年8月，在广州和澳门前后活动了27年的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去世。不久，“他在广州和澳门的朋友”即有成立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教育团体之议。他们于1835年1月26日发布了一份有22人签名的通告，宣布打算成立马礼逊教育会（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并很快募到了4860元捐款。为了进一步推动计划的实施，由英国商务监督罗便臣、英商查顿、美商奥立芬、英商颠地、马礼逊之子马儒翰和美部会传教士裨治文等6人，组成了一个筹办马礼逊教育会的临时委员会，并决定在理事会成立前以英商怡和洋行为司库，裨治文为秘书。这个临时委员会于1835年2月25日在广州又发出一份《通告》，要求人们在财政上支持创立马礼逊教育会，并指定了广州、澳门、加尔各答、伦敦、曼彻斯特、巴黎、波士顿、纽约、费城共9个城市接受捐款的代理人或代理机构。^①

1836年9月28日，有关人士在广州商馆美国行2号集会，由临时委员会主席颠地、英商福克斯（Fox）主持，通报筹办情况，讨论由裨治文起草的马礼逊教育会章程，并选举职员。11月9日，再次举行会议，正式宣布成立马礼逊教育会，并通过该会章程和条例。会议选出颠地为该会主席，福克斯为副主席，查顿为司库，裨治文为通讯秘书，马儒翰为会议秘书。以上5人组成马礼逊教育会理事会。^②

根据章程，马礼逊教育会以在华开办和资助学校为主要活动内容。该会成立后的一件引人注目的活动，是着手调查中国的教育状况，特别是初等教育的情形，作为进行具体的教育活动的参考。他们在中国内地（以广州—澳门地区为主要对象）所调查的内容分为18个项目：人口、社会阶层、男女比例、学校种类、男性识字率、女性识字率、儿童入学年龄、蒙学读物、教学法、儿童学习年限、每日学习时间、学校状况、学生人数、教师素质、教师薪金、考试、奖赏、惩处。这种调查，获得了关于中国初等教育一般状况的第一手资料。他们还请求马尼拉、巴达维亚、槟榔屿、马六甲、新加坡、曼谷

等地的一些人士代为调查当地中国人社区的教育状况，调查内容除以上所列项目外，还要求代为调查的人士指出中国人的教育制度和办法可以改进之处。^⑤这种调查，为后来马礼逊学校确立自己的教育方法奠定了基础。

在马礼逊教育会最初的几年，它本身并无学校。1837年裨治文撰写的年度报告说，马礼逊教育会已收留了5名儿童，并使他们受到教育，其中两名在新加坡，三名在广州。从有关资料来看，在广州的三名少年是跟随裨治文和伯驾等传教士的。此外，马礼逊教育会还向郭士立夫人在澳门开办的学校提供资助，数额为每年312元。^⑥

但马礼逊教育会在成立后不久的1837年1月，即分别致信美国耶鲁大学和“英国与海外学校协会”（British and Foreign School Society），请他们代为物色教师，以开办教育会自己的学校。^⑦耶鲁大学很快有了回音，三名教授向马礼逊教育会推荐了该校毕业、曾任教于纽约聋哑学校的布朗（Samuel Robbins Brown）。布朗夫妇于1839年2月19日抵达澳门。^⑧不久他又到广州活动，与在广州的教育会理事会成员见面并交换意见。^⑨

布朗在开头的一段时间主要是学习中文。头几个月与卫三畏住在一起。1839年11月4日，布朗夫人搬入原郭士立夫妇的住所，并正式开办马礼逊教育会学校（以下简称马礼逊学校）。^⑩第一批学生为6名，此后至1841年，虽中间有所变化，但学生人数则保持不变。因布朗夫人健康不佳，布朗夫妇于1841年3月31日与美部会另一名传教士雅裨理一起到南洋休养，观摩了马六甲、新加坡等地中文学校的教学状况，至9月7日返回澳门。在此期间，马礼逊学校的管理和教学由美国圣公会教士文惠廉（William Boone）的夫人和伦敦会传教士美魏茶（William C. Milne.）负责。^⑪

1840年3月，马礼逊学校又招收5名学生入学，组成一个新班。1840年11月，容闳入学^⑫。1840年进校的这些学生，与以前入学的几个学生，中途均有退学，到1841年10月，总的人数仍为6人，后来组成布朗所称的“第1班”。容闳在他的《西学东渐记》中也说，他与在他之前入学的其他5名学生是“开校之创始班”。1841年10月29日，又有12名新生入学，加上不久后增加的两名，后来成为“第2班。”^⑬

1843年，因英国已割占香港，马礼逊教育会及马礼逊学校，在得到港英当局的许可后，迁离澳门，搬到香港。因大部学生来自澳门周围地区，有6名学生的家长不欲孩子离开家乡，将他们领走；再加上历年退学、逃学和因“顽劣”、“愚钝”等原因而被除名者多人，到香港时学校只剩下11名学生。1843年4月，该校将12名新生录取入校，5月、9月又各有一名学生入学。这些学生中，除来自广州、澳门、香港地区的占大多数外，还有来自南京、宁波和新加坡等学生。他们构成“第3班”。^⑭1844年下半年，陆续有10名学童进入马礼逊学校，被编为第4班。^⑮

这4个班级，一直维持到马礼逊学校解散，也没有增加新的班级。根据有关资料，先后在马礼逊学校就读的学生，约为50多名，其中，据布朗公布的学生名单，1843年9月前先后有44名学生就读，1844年有10名学生进入学校，即第4班。此后，再未成批招收学生，学生人数呈下降趋势。

马礼逊学校自开办之日起，长期由布朗任校长兼教师。在他到南洋航行度假期间曾代为照管学校的文惠廉夫人和美魏茶，后来分别前往厦门和舟山。马礼逊教育会理事会原本打算请“英国与海外教育协会”在英国代觅教师。并负担这名教师的费用，结果却久无下文。布朗面对学生增加而他无力兼顾的局面，曾在1843年的年度报告中呼吁教育会尽快增加教师。^⑯在此情况下，马礼逊教育会只得再次委托耶鲁大学代请教师。耶鲁的几位教授这次又不负所托，1844年为马礼逊教育会请到该校的另一位毕业生威廉·

麻西 (William Allen Macy)。麻西经一年多的准备, 于 1846 年 3 月来到香港, 成为布朗的助手, 并马上就承担了第 2、4 班的教学任务。^⑤马礼逊学校于是短暂地拥有两位英文教师。但布朗这时却决定离开学校, 回美国居住, 原因是他的夫人以及他本人的身体状况不佳, 需要回新大陆恢复健康。1847 年 1 月 4 日, 布朗夫妇携带 3 名学生, 即容闳、黄胜、黄宽, 启程赴美。这样, 麻西就完全取代了布朗的角色。布朗回国, 名义上是为了休假, 但他一去不回, 留下麻西, 坚持到 1850 年, 在马礼逊学校关闭后回美国。

在麻西到中国之前, 有两个美国传教士到香港的马礼逊学校协助过布朗。一个是哈巴安德 (Andrew Happer), 他是美国长老会传教士, 1844 年 10 月 23 日到达澳门。因布朗生病, 他应邀前往香港顶替布朗一段时间, 从 1844 年 11 月到 1845 年 4 月在香港的马礼逊学校任教。^⑥另一个是美部会的邦尼 (Samuel William Bonney)。邦尼于 1844 年毕业于纽约大学, 同年受美部会的派遣, 打算前往印度, 后因故未行, 转而临时受聘为马礼逊学校教师, 1845 年 3 月到达香港后, 即任教于该校, 负责第 2、4 班的教学。次年 3 月麻西到任后, 他解除教职, 转而成为美部会广州传教站的传教士。^⑦此外, 麻西自己的母亲也于 1847 年 4 月来到香港。据麻西所写的报告, 她在 1848 年负责照管第 4 班, 从而减轻了麻西的负担。^⑧

关于马礼逊学校的教师, 还应提到的是, 它自始至终聘请了中国教师, 按中国的传统方法教授汉语知识和四书五经。中国学校的学生每天有一半的时间, 用于学习中文, 这方面的教学任务主要由中文教师担任。布朗在历年的年度报告中对他们也有所提及, 但语焉不详, 没有提供中国教师的个人资料, 连前后有几人也没有说明, 容闳的《西学东渐记》则只字未提。因此这些教师尽管在马礼逊学校的教学活动中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有关他们的情况却难以明了。

马礼逊学校后因经费困难, 于 1850 年最终停办。马礼逊学校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问题, 是因为它没有及时适应鸦片战争前后中外关系的巨大变化。它的建立与生存, 在经济上主要依赖于在华外国人、特别是英美商人的捐资赞助。在鸦片战争以前, 广州是唯一的通商口岸, 是富商云集之地, 也是鸦片贩子活动的主要地点。如美国商人奥立芬就是马礼逊教育会一位热心的赞助者。颠地、查顿、孖地臣等鸦片贩子, 虽臭名昭著, 却握有巨资, 同时对教育会的事务也有兴趣, 是比较积极的捐助者。但鸦片战争后, 五口通商, 各国商人迅速分散到各个通商口岸, 对马礼逊教育会来说, 原来的经济来源也大大分散了, 创办之初的主要赞助人, 或退出对华贸易, 或死去, 更多的是将视线转移到其他地方。而马礼逊教育会不仅没有设法开辟财源, 反而僻处香港一隅, 将其生存空间局限在当地的外国人社区, 遂不可避免地每况愈下。笔者所看到的一份 1842 - 1843 年马礼逊教育会所收到的捐款记录, 上面没有一个原来主要赞助人的名字, 而且大部分捐款数额都不大, 最大的一笔私人捐款为 170 元, 最少的为 3 卢比 (约合 1.2 元)。^⑨马礼逊教育会的最后一次年度报告, 也坦承它得到的捐款逐年减少, 到 1847 - 1848 年度, 只有 1366 元, 而它的预算, 却至少是 3375 元, 加上马礼逊基金会的利息, 仍然要面临数目颇大的赤字。它寄希望于港英政府恢复以前给它的每年 1200 元的津贴,^⑩这样可以将学校维持下去。但看来这个愿望最终也落了空。

当然, 英美传教士象商人一样分散到各地, 也使马礼逊教育会失去了另一种支持。如担任马礼逊教育会会长的裨治文, 1847 年离开广州后, 就一直呆在上海, 实际上已不过问教育会的事务。

考察马礼逊学校的日常教学状况，从中可以了解容闳在赴美之前所受到的知识教育。

马礼逊学校实行的是中英文双语教育。考虑到所收的学生将来要在中国谋生，布朗在开始时便将学生的学习时间分为两部分，“半日中文，半日英文。”^⑧一般上午学汉语，下午和晚上学英语课程。这样的安排一直到布朗回美国，均无大的改变。容闳后来回忆，“英文教课列在上午，国文教课则在下午，”^⑨可能有误。

负责中文教学的是由马礼逊教育会雇来的本地先生。从布朗所提供的情况来看，先后几位教中文的先生都“忠实地按中国方式教书”，教学生“记诵中国经典”，即四书五经，并学习书写。布朗在《马礼逊教育会第4次年度报告》中对该校的中文教育状况，有如下叙述：“在中文教育方面，学生们仍被教给这个国家最流行的东西，由去年雇请的那位教师任教。他在教书方面可能与中国大部分的教师水平相当，对教书的兴趣亦与众人相仿。有10名学生已背会或接近背会《四书》的全部内容，并进行了复习。而第1班的一个学生，则致力于朱夫子对《四书》的注解，现正努力加以理解。大部分学生能理解孟子著作的意思，少数人可以懂得孔子的著作，但除一些片段外，《诗经》的大部分内容不能为学生所理解，因为这是最难的经典之一。有些人试图将《孟子》译成英文，在我的指导下，他们还打算练习将中文版的《圣经》译成英文。……有时要求他们用中文写信，与中国人办的学校对学习了相同年数的学生的要求相比，这显得有些过早。”^⑩次年，马礼逊学校的学生在中文学习方面似乎继续有所进步。布朗在报告中说，学生的中文教育“现由一位本地教师负责。我能肯定的是，这些学生在他的教导之下学习中文，可以象在本地其他学校中学得一样好。”布朗按自己对教育的理解，决心在中文教育方面尝试进行一点改革。他报告说，“我终于找到一位教师，可以每天花上部分时间，向两个高年级的班级讲解课文。我相信，对水平如此参差不齐的学生这样做，是前所未有的。”^⑪

1844年，换了一位中文教师，布朗报告说，这名年轻人“表现令人满意，是迄今请到的最好的中文教师。他向听得懂的学生讲解以前背诵过的内容，学生们就围坐在他的周围。”这位布朗很欣赏的、作风比较欧化的中国先生，同时还教学生“以中文作文；或是从经典中摘出句子，然后缀上一些相对应的意思不同文句；或是以同一作者的某种论点为中心，以相似的文笔，或多或少地加以敷衍扩充。”布朗还介绍说，“他已教完《大学》，现已开始讲《四书》中的另一部。”因为他一个人忙不过来，布朗又将一名已读完“中国所有教科书”并在其父亲的私塾里帮过忙的男孩录取入学，以帮助这位中文教师，条件是让他免费在校学习英语，并给他提供衣着。^⑫在这之后，就很少看到有关马礼逊学校中文教育的资料。布朗和麻西的年度报告都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明，学生们仍在学习中文。

从上面提到的有限的资料来看，马礼逊学校的中文教育，虽不能称卓有成效，但如布朗所说，与当时普通中国私塾相比，也并不逊色。以容闳所在的第一班而论，3年左右的时间学完《四书》，进度并不慢。而且布朗还在学习过程中加进讲解经典内容的课程，较之一般私塾，还有其优势。容闳说，他从美国回国之时，需花时间在广州补习汉文，“予以久居美洲，于本国语言，几尽忘之。至是乃渐复其旧。不及六月，竟能重操

粤语，惟唇舌间尚觉生硬耳。至于之汉文，乃于一八四六年游美之前所习者，为时不过四年，以习汉文，学期实为至短，根基之浅，自不待言。故今日之温习，颇极困难，进步亦缓。”^⑧从这段话来看，容闳在马礼逊学校时期打下的中文基础似乎不甚牢固。但与其他学生相比，容闳的情况似乎比较特殊。他7岁时（1835年）进郭士立夫人在澳门设立的学塾，这个学校也有汉语课程。^⑨1839年该校结束后，容闳有一年多的时间为生计奔波，然后进马礼逊学校，学习汉语课程5年。故他学习中文的时间，前后有8到9年，不可谓太短。然而容闳可能在英文方面更加用功，“读音颇正确，进步亦速。”^⑩对中文可能不太重视。

容闳在学习上的这种取向，是马礼逊学校办学宗旨的非常典型的反映。虽然中文教育在马礼逊学校始终占有一席之地，但该校的重点是英文教育，包括英语和主要以英语讲授的其他课程。马礼逊教育会成立之前负责筹办的临时委员会于1835年2月25日在广州发出的通告，有一段文字简要阐述了设立该会的宗旨，兹译录如下：

正如中国语言文字的知识给外国人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对英语的掌握也将为这个帝国的人民带来同样的或更大的好处。为实现将这一利益带给中国人，并帮助马礼逊所开创的伟大事业之目的，现准备建立一座以他奉献了一生的目标为思想特征的，比大理石和黄铜更为持久的纪念碑，它叫做“马礼逊教育会”。这个机构的目的，是在中国建立并资助一些学校，以教育本地的青年，使他们在掌握本国语言的同时，能够阅读和书写英文；并能借助这一工具，掌握西方各种门类的知识。在这些学校，将要求阅读《圣经》和基督教书籍。^⑪这段文字后来也刊载在马礼逊教育会的成立公告中。这就明确了，英语教育在马礼逊教育会所举办的事业中将拥有优先的、主要的地位。马礼逊学校开办后，布朗将这一宗旨落实到具体实践中。在历年的年度报告中，布朗和后来的麻西所津津乐道的，都是学生在英语学习方面情况，包括课程教学的内容和学生所取得的进步。从中可以了解到，英语阅读、写作等课程，是始终列入教学日程的。而不少课程都以英语上课，学生在英语听、说等方面自然得到很多的锻炼机会。关于学生在英文学习方面所达到的水平，可以从现在能看到的第1班学生所写的两封英文信件和6篇英文作文来衡量。

这里提到的两封信写于1842年6月20日，收信人均均为裨治文。实际情况是第1班，即容闳所在的班级的7名学生，应裨治文的要求而分别给他用英文写了一封信，而裨治文则在他主编的《中国丛报》上将其中的两封未加删改地加以刊登。^⑫尽管裨治文认为这7封报告学习情况和谈感想的书信“都值得赞扬”，但选登的两封显然是其中写得最好的。写信人的姓名被隐去。

6篇英文作文则是为1845年9月24日马礼逊学校举行的公开考试而作的。所谓公开考试，是布朗和裨治文等邀请马礼逊教育会成员和其他各界人士到学校观看对学生进行的各科考试，有的应邀主持考试，以检验学生的学习状况，展示马礼逊学校取得的成绩，以争取各方面的资助，缓解资金短缺的窘境。这6篇作文均为第1班学生所作，当时这个班有6名学生，每人1篇，全部在《中国丛报》上发表，也未经删改，但同样也都未注姓名。各篇的题目分别是：“人生是一座建筑，青年时代是基石”、“中国政府”、“劳动”、“一次幻想之旅”、“圣经”和“中国人关于来世的观念”，^⑬所谈论的内容各不相同，涉及人生观、政治、地理、中国民间文化和《圣经》的来源与结构等多方面的问题，比较综合性地反映了这个班学生的知识水平。

这里先要讨论一下的是这些文章和两封信所体现的英文水平。现在不知道两封信的

作者中有没有容闳，6篇作文中有一篇必定是容闳所作，但没有什么线索可以判断他所写的是哪一篇。笔者阅读这些信和作文，虽觉各篇的语言水平和知识、思想水平尚有参差，但总的来说，没有在其中看到那一篇有明显的语法或用词错误，语义含混的也不多，句子大都畅顺，表达方面也都富有变化，文章结构也都能做到首尾浑然。总之，这些文章、信件虽然都还达不到优雅精致的境界，但都能以比较流利的行文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感受。其中写得比较好的是两封信中的第一封和谈论“中国政府”与“幻想之旅”的两篇作文。按容闳自己的说法，他在英文学习方面进步颇快，其英文水平应可居于这些作者的中游以上。总的来看，马礼逊学校在英文教学方面是比较成功的。

除英文外，马礼逊学校用英语教学的还有地理、历史、天文、算术、代数与几何、力学、音乐、伦理学、圣经讲解等课程。马礼逊学校规定，学生入学以后必须保证在校学习8年，学完之后达到相当于中学的水平。这些课程中，除英语学习从进校时就开始外，其余从第2年或第3年开始，陆续开设，并持续到结业时为止。但因学校于1850年初最终解散，除第一班外，其余班级均未完成学业。这些课程的设置，参考了马六甲英华书院、新加坡坚夏书院等校的经验。如上述课程与英华书院的课程就有不少相似之处，虽然二者是不同类型的学校。由于教科书、教学用具和教师都很缺乏，布朗等要求学生有些课程多次进行复习，因此总的来看，进度并不快。代数课在算术课之后开设，几何课一般又比代数开得晚。力学课开得更晚，1844年5月开课，从三大运动定律和引力定律开始讲。1846年4—8月，布朗请在香港的一位英国医生巴富尔(Dr. Balfour)给第1班的学生上化学课，每周两次。一开始学生还可以跟得上，但学到化学元素和化合物时，学生便对那些复杂的化学名词术语望而生畏，最后除年纪最大、成绩最好的一名学生外，其他学生均表示不愿再学，遂停课。^⑥

为了弄清容闳在留美之前的学习情况，现将他所在的第1班历年所学课程及有关情况加以整理，结果如下表：

年度	所学课程与教科书			备注
1839—1840	英语 阅读和口语 布朗编写的教材	地理 Parley 编写的教材	算术 Gordon 编写的教材	
1841—1842	英语 阅读 Gallaudet's Child's Book on the Soul	地理 Guy's Geography	算术	历史 Peter Parley's Method of Telling Stories About the World 历史课讲授英国与美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
1842—1843	英语 阅读 写作 书写练习	地理	算术 代数 Colburn's Intellectual Arithmetic; Sequel	历史 Keightly's History of England 罗马人入侵至查理一世时期
1843—1844	英语 阅读 写作 英文书写	地理 欧洲、非洲、美洲及部分亚洲地区的自然地理	算术 代数 几何 Colburn's Sequel	历史 教材同上年度 查理一世至维多利亚女王时期 1844年5月开始学习力学三大运动定律与引力定律

年度	所学课程与教科书			备注	
1844—1845	英语 阅读 写作 Goodrich's Third Reader	地理 各种地 图	算术 代数 几何	力学 结束初 等课程	本年度开设 声乐课程
1845—1846	英语 阅读 作文 以《圣 经》为教材	地理	代数 Colbum's Algebra 几何 Euclid's Ele- ments of Geome- try		

资料来源：马礼逊教育会 1839—1846 年各年度报告，见《中国丛报》第 6—15 各卷。

上表所依据的资料还不够完整，但可以大致反映马礼逊学校的教学内容，也可以反映除中文学习外，容闳在留美之前所受到的知识教育。

三

英美传教士和其他人士创立马礼逊教育会及其学校，其目的决不在于仅仅办一件慈善事业。除了以教育作为手段来推进基督教的传播外，他们还希望以此推动西方文化向中国的传播，从而在文化观念方面战胜中国这个已经落后的、但继续妄自尊大的老大帝国。宗教和文化上的这些目的也反映到马礼逊教育会指导思想和马礼逊学校的教学内容之中。

马礼逊学校的条例中规定，不以是否信仰基督教作为是否接纳学生入学的条件。但作为一所有着鲜明的宗教背景，并由传教士执教和管理的学校，不言而喻会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马礼逊学校向每个学生发《圣经》，在英语学习课程中以《圣经》为教材，布朗等在教学过程中向学生讲授基督教的知识，让学生参加祈祷、礼拜等仪式，这些都可以看作马礼逊学校的宗教教育。马礼逊学校的学生后来有多少人加入了基督教，现在没有什么记载。但容闳后来在美国入教，与他早年在马礼逊学校所受到的宗教熏陶，是不无关系的。

在宗教以外，马礼逊教育会和学校的另一个目标是改变中国人，首先是让中国青年受西方文化的教育。裨治文在马礼逊教育会成立时发表的演讲中说，“如果我们面前有一份 1500 年前的欧洲和中国地图，在那上面将每个国家依其在知识和文明方面进化的程度，以明暗的色调加以标示，我们可以设想，中国至少在很多方面都会显示出优越的地位。”但从那以后，欧洲进入了迅速进步的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携手前进。而中国，按裨治文的想法，“不仅没有取得什么进步，反而在后退，知识在减少，这一代的人还不如一千年前处于同样地位的祖先。”他认为应当改变这种状况。“我们可以共同努力，向他们传授宝贵的知识……我们可以马上让几十个，而不是几百个，贫苦的儿童进入我们运作良好的学校，使他们在帝国最好的子民中发挥影响。我们可以做得比这更多，通过向他们展示神圣的启示，他们可以成为教师和模范……他们可以先学习，然后再去教导别人。”^⑨布朗在 1843 年的报告中也说，“人们将会看到，向中国人传授关于西方世界的知识，是那些世界上最文明的基督教国家自豪的人民最有价值的目标。……我们同时应该记住，我们所具有的优势和地位，应该归功于《圣经》，归功于我们接受并实践其观念的程度。这部书中所包含的慈善观念，促使我们将他们提升到与我们同样的地位。”^⑩

布朗还多次抨击中国当时的教育制度和办法。他认为中国“所谓‘古老的教育体系’，只是为这个国家培养了勤恳的沉默的臣仆，而从未以支持完整自由的人格发展为目的。……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培育身心健全的、高尚的人。这是中国的教育体系达不到也不想达到的。马礼逊教育会将要驱动变革之轮，……我们前来将中国青年从这种毁灭性的黑夜中拯救出来。”他相信，“一旦教会他们读、写、说英语，他们的心灵马上得到解放，他们将不再封闭在先前狭隘的观念里，而是走向对知识的探求。”^①在1842年的报告中，他抨击的对象是中国使用的教科书，即《四书》《五经》。他认为，“最为令人遗憾的这种教育过程对民族心灵的影响。它不仅使人们得不到最为需要、也最有用的知识，而且将老老少少一心向学的人的注意力，限制在那些充斥着深奥的玄想、梦呓般的废话和偶尔有些实用的智慧的书籍之中。”结果这些书籍成为“中国教育系统的真正障碍。”^②

裨治文和布朗的这种思想，被用于长期对学生进行的观念方面的教育。马礼逊学校的学生在其影响之下，不可能不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他们的看法。我们仍然可以从上述学生的信件和作文中来观察这种影响的表现。例如，一个学生上面提到的两封信中的第一封里这样写道：“我在这个英文学校已经两年半了。我认为在这里的所获百倍于我以前蹉跎四年光阴而得到的知识。……中国人在教育方面很愚昧……英文学校比中文学校要好得多，因为英国人学习很多有用的东西，如天文学，几何学，代数，真正的宗教，以及许多其它我现在还不能跟您谈论的东西。而中国人却没有这些东西。”第二封信的作者发表对中、英区别的见解，他说“中国人和英国人之间的巨大区别是，中国人面向古代，但英国人则面向现在和未来，力图发现真理。所以中国人老是原地踏步，而英国人则越来越好。”^③这些论点，与上述裨治文和布朗等观点、说法，可谓非常相似，确是他们教育的结果。1845年发表的那6篇作文中，有一篇谈论中国政府的文章。作者开头就说，“中国不能说有一个好政府，它与不列颠或北美合众国，或其他任何基督教国家完全不同。”这就把当时中国士大夫所信奉的华夷观念来了一个颠倒。他进而说道，中国政府官员“数量如此庞大，但对外国人来说奇怪而令人作呕的是，他们没有什么用。如果这个由英国人来统治，一半数量的官员就能把国家治理得很好。”^④

这些言论，也许可以看作学生试图取悦于自己的老师而发出，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生们在相对封闭的教育环境中，在传教士的熏陶之下，思想观念确实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我们不知道这几篇文字里是否有出自容闳之手的東西。但生活、学习在这样的环境中，少年容闳对布朗又深怀敬仰之心，受其影响，是可以想象的。容闳后来以促成并负责中国幼童留美为毕生的大事，固然主要与他在美国留学8年，受到西方文化的深刻影响有关。但他在马礼逊学校这个处在中西文化交汇之点的教育机构所受的知识与思想两方面的教育，对他一生的事业与思想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本文对马礼逊学校的考察，不仅可以为研究容闳的早年生涯提供一个具体的视角，而且可以为对鸦片战争前后教会教育的起源与形态的研究，提供一个有典型意义的个案。但因笔者掌握的资料也很有限，疏漏之处在所难免，希望得到指正。

注释：

①Circular of the Provisional Committee, in Papers of the American Board for Foreign Missions, 16. 3. 11. 《临时委员会通告》，见美部会文件，卷

号 16. 3. 11

②Proceedings relative to the formation of the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 in Chinese Repository vol.

5, pp. 373-375. 《马礼逊教育会成立经过、章程、理事会成员及关于其宗旨的评论》,《中国丛报》卷5,第373—375页,1836年12月号。

③《中国丛报》卷6,第232—241页,1837年6月号。

④《中国丛报》卷6,第231—232页;卷7,第306—307页。

⑤《中国丛报》卷6,第229—231页。

⑥《中国丛报》卷7,第550—551页,1839年2月号。

⑦同上卷10,第569页,1841年10月号。

⑧A Brief History of the Mission of 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美部会在华传教简史》(稿本),见美部会文件,16. 3. 9,第76页。

⑨《美部会在华传教简史》第79页;《中国丛报》卷10,第578页,1841年10月号。

⑩容闳在《西学东渐记》中说他1841年入学,但依布朗在1843年12月公布的学生名单,他应为1840年11月入学。名单中Awing即容闳。见《西学东渐记》岳麓书社“走向世界丛书”本,1985年版,第46页。

⑪布朗:《马礼逊教育会第4次年度报告》,《中国丛报》卷11,第545—546页,1842年10号。

⑫布朗:《马礼逊教育会第5次年度报告·学生名单》,《中国丛报》卷12,第623页,1843年12月号。

⑬同上卷13,第629页,1844年12月号。

⑭《中国丛报》卷12,第629页,1843年12月号。

⑮Alexander Wylie, Memoir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Shanghai, 1867. 伟烈亚力:《来华新教传教士纪念集》,第233页;布朗:《马礼逊教育会第8次年度报告》,《中国丛报》卷15,第607、609—614页,1846年12月号。

⑯Loren W. Craftree, Andrew P. Happer and Presbyterian Mission in China, 1844-1891, in Journal of Presbyterian History, Vol. 62, No. 1, Spring, 1984. 罗伦·克拉夫垂:《哈巴安德与长老会在华传教事业》,《长老会历史杂志》卷62,1984年春季卷,第20页。

⑰《新教来华传教士纪念集》第149—150页;

▲吴义雄 中山大学历史系 副教授 邮编 510275

《中国丛报》卷14,第473页,1845年10月号。
⑱《中国丛报》卷18,第39页,1848年1月号。

⑲List of Subscriptions and Donations, received in 1842—43, 《1842—1843年捐款名单》,马礼逊教育会秘书卫三畏所撰《通告》附件,美部会文件,16. 3. 8, vol. 1A。

⑳《中国丛报》卷18,第34—35页。按这笔津贴原为东印度公司给马六甲英华书院的拨款,后由英国驻华商务监督继续拨付。1843年英华书院迁往香港时,这笔款项被当时兼任英国驻华商务监督的璞鼎查转给了马礼逊教育会。但德庇时继任港督兼英国驻华商务监督后,将这笔拨款停止。到文翰继任时,马礼逊教育会再次提出了要求。

㉑《马礼逊教育会第3次年度报告》,《中国丛报》卷10,第569、571页,1841年10月号。

㉒《西学东渐记》第46页。

㉓《中国丛报》卷11,第547页,1842年10月号。

㉔《中国丛报》卷12,第624—625页,1843年12月号。

㉕《中国丛报》卷13,第630页,1843年12月号。

㉖《西学东渐记》第68页。

㉗见马礼逊教育会第1、2次报告,《中国丛报》卷6,第231—232页;卷7,第307—308页。

㉘《西学东渐记》,第46页。

㉙《临时委员会通告》,美部会文件,16. 3. 11。

㉚《中国丛报》卷11,第339—340页,1842年6月号。

㉛《中国丛报》卷14,第497—519页,1845年11月号。

㉜《马礼逊教育会第8次年度报告》,《中国丛报》卷15,第611—612页,1846年12月号。

㉝《中国丛报》卷5,第379—381页。

㉞《中国丛报》卷12,第618—619页。

㉟《中国丛报》卷13,第613—632、639页。

㊱《中国丛报》卷11,第549页。

㊲《中国丛报》卷11,第339—340页。

㊳《中国丛报》卷14,第506页。

(责任编辑 江中孝)